

数十万义勇军以血肉搏寸土 起来！起来！

本报记者 张颖



在场

“王介予、孙忠臣”是这面不断延伸的名录墙上，最新镌刻的两个名字。姓名，不过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。二百三十五个名字静静排列。十四年抗战，众多义勇军将士本溪桓仁，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的名录墙上，二千孙忠臣。丁克、丁世恩、马占山、王凤阁、邓铁梅……王介予、

2235个名字

步入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，时光仿佛凝固。气势磅礴的雕塑群眼神如炬；展柜中，残破的衣帽、锈蚀的刀枪、泛黄的纸页……无声地诉说着14年间白山黑水间那场气壮山河的悲壮史诗。从2015年筹建纪念馆开始，我们一直在寻找抗日义勇军老战士的信息。”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副馆长邢燕来说。2024年，一个名字被重新点亮——孙忠臣的外孙周世森来到馆内，郑重捐赠了珍藏的外公的印章和烟口袋。经相关部门严谨查证，历史终于确认：孙忠臣，曾参加义勇军大刀队及东北抗联。1937年2月，他在“西江惨案”中幸存，成为那段血火岁月的珍贵见证者。他也成为纪念馆名录墙上的第2235个名字。90多年前，如孙忠臣般挺身而出的普通民众，有千千万万。九一八的枪声撕裂黑夜，不甘做亡国奴的东北儿女，从军官到农民，从乡绅到学生，纷纷拿起武器。“义勇军”“救国军”“自卫军”……他们共同的名字，叫“东北抗日义勇军”。“甲午战争后的50年间，日本成为

中国最凶恶的侵略者和最贪婪的掠夺者。辽宁则是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，控制最严密的地区。”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部主任王超指出，“九一八事变后，面对日军的残暴统治，东北人民意识到不反抗只有死路一条。哪怕是最微弱的希望，也要拼力一搏。”

东北军第七旅的将士们，将“不予抵抗”的荒唐训令掷于脑后，率部在北大营血战至天明；唐聚五发出“纵余一枪一卒，亦必奋斗到底”的怒吼，于1932年4月21日在桓仁振臂一呼，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，辽东14个县一体响应，辽宁民众自卫军“杀敌讨逆，救国爱民”的口号响彻山野；乡绅王冠五，毅然卖田卖地，拉起队伍在宽甸山林中痛击日寇……

锈刃战钢刀

一张泛黄的《辽宁民众自卫军光复区域略图》引人注目。图上清晰标注着光复区、未光复区与苦战区。“这张地图非常珍贵”，邢燕来解读，“它记录下辽东桓仁、宽甸等地短暂却耀眼的胜利——那是义勇军将士用血肉一寸寸夺回来的国土。”桓仁唐聚五广场，将军跃马挥枪的雕像巍然屹立。他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，短短半年壮大至37路10万余众，历经百余战，一度收复桓仁、通化、新宾、宽甸等东边道20余个县。

胜利从何而来？展柜内两件冰冷的武器，无声揭示着最惨烈的答案：一把日军不锈钢军刀，90多年后依然寒光逼人；与之相对的，是义勇军所持的一把锈迹斑斑、刀柄残损的砍刀，如今怕是连麻绳都难以斩断。据一份史料记载，1932年辽宁民众自卫军的某次战斗中，300名战士仅有87支步枪，其余人持砍刀、红缨枪冲锋。

另一张作战地图上，17处用红笔圈出的箭头，指向同一个目标——沈阳。1931年11月至1933年5月，义勇军向这座沦陷的东北“心脏”发起17次决死进攻。要打就打敌人的指挥中枢，向死而生，才能让关外的山河听见反抗的枪声。攻打沈阳的战斗虽然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，但也重创了敌人嚣张的气焰。义勇军缺枪少炮，却不缺把尖刀插进敌人胸膛的万丈勇气！

生死战友

丹东地方史专家黄文科，用了整整三年光阴，终于破译一封来自1934年的“无字天书”。信笺正面，是寻常的家常问候。翻



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内陈列的《血肉长城》群雕版画。 本报记者 田勇 摄

转背面，一片空白下却隐藏着惊心动魄的秘密——用米汤书写的密信内容，需碘酒涂抹方能显现暗红字迹：“悲痛，悲痛，我把一个极悲痛的消息报告给你们，邓铁梅在旧历四月十九日夜里，被伪军捉去……”这是邓铁梅被捕后，战友苗可秀写给东北民众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的密信。九一八事变后，来到北平的苗可秀加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。1932年2月，他受东北民众救国会指派到邓铁梅部开展工作，邓铁梅坚定的信念深深感召了这位热血青年，苗可秀毅然加入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。从此，两人在危机四伏的“辽东三角地带”（安奉铁路以西、南满铁路以东、黄海以北，涵

盖安东、凤城、岫岩、庄河、海城、辽阳等地），率部与日伪军浴血周旋，屡建奇功。黄文科介绍，丹东市档案馆馆藏的苗可秀密信共有5封，分别写于1934年12月18日、1935年2月20日、3月14日、4月5日和4月25日。记录了苗可秀在自卫军中的艰险工作、辽东惨烈的抗日战况、严峻的战争形势，以及队伍面临的物资、枪弹极度匮乏的困境。其中一封信，还详细描述了苗可秀组织在敌占城市秘密张贴抗日标语的行动细节。苗可秀后来亦不幸被捕。狱中，他写下最后的嘱托：恳请王卓然收养妻儿，并为儿子取名“苗抗生”——一个承载着父亲全部信念与期望的名字。遗憾的是，这些狱中绝笔，正如王化一痛惜所言：“可惜

当时未注意保存，不遭遗失。”如今，在凤城市中心，“苗可秀街”与“邓铁梅路”丁字相交，车水马龙间铭记着两位生死战友的不朽情谊。南山脚下，“邓铁梅 苗可秀永垂不朽”的纪念碑巍然矗立，俯瞰着他们曾誓死保卫的土地。“这不仅是两条路、一座碑，更是深植在凤城人心中的精神坐标。”中共凤城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胡水清说。

燎原之火

“低矮的茅草屋中，一名共产党员正满怀激情宣讲党的抗日主张，围坐的义勇军将士们屏息凝神，眼中闪烁着认同的光芒，攥紧的拳头透露出内心的澎湃。”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内的一幕原场景，令人动容。

九一八的炮火撕裂山河，中国共产党迅速行动：从各地抽调党员骨干奔赴前线，深入义勇军各部；选派优秀青年加入抗日洪流；广泛动员工农、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投身武装斗争；更发动社会各界募捐，组织“义勇军后援会”“慰劳团”，为奋战的将士们输送物资与精神支持。

锦州城下，黄显声组建抗日义勇军之初，便得到了中共党员刘澜波鼎力协助。短短两个月间，20余路抗日义勇军如燎原之火在辽西燃起；在辽阳小堡，共产党人冯基平、共青团员李兆麟等挺身而出，直接参与领导当地的抗日义勇军武装；建平县的热血青年高体乾拉起抗日队伍后，在党组织的引导下，迅速发展至二三百人；而在邓铁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中，中共满洲省委原委员邹大鹏呕心沥血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组织与思想工作……

正是通过各地党组织不懈的努力，到1932年3月，党的火种已在辽西、辽北、辽南、辽东的抗日义勇军各部扎根。“许多义勇军主动寻找党……要求党的直接指挥。”王超指出，“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遣了200余名党员骨干直接投身义勇军，其中近半数被派往辽宁各路义勇军中。”王超强调，“这批经过战火淬炼的骨干，不仅在当时壮大了抗日力量，更为日后党独立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积累了宝贵经验，为创建东北抗日联军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干部基础。”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，常遇前来开展党课教育的人群。受抗日义勇军英勇事迹启发而创作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在“国歌厅”响起，激昂旋律与名录墙上的铁血名字遥相呼应。这些用生命践行“起来”的先驱，让国歌成为永不褪色的民族号角。

未完的“讲述”

本报记者 孙明慧 文并撰



见证

90余年光阴流转，当年高举义勇军战旗、在烽烟中浴血奋战的将士们，身影已渐渐隐没于历史长河。随着亲历者的相继离世，那些承载着战火记忆的第一手口述史料，更显弥足珍贵。沈阳市档案馆珍藏着一批特殊的口述档案——它们采集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生动记录了关于义勇军的战斗故事，是那段波澜壮阔的民族抗争史中不可替代的原始见证。王梓熠，沈阳市档案馆保管利用部部长，自2015年起，他与同事一起深入挖掘、系统梳理馆藏抗战专题档案，并实施数字化保护。“近十年间，我们整理并汇总了馆藏抗战档案”，王梓熠介绍，核心成果主要涵盖3个方面：其一为《1911至1931年奉天地区日本侵略活动档案》（该批档案于今年国际档案日入选第六批《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》）；其二聚焦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奉天地区（今沈阳）的残暴统治；其三则是关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及抗联战士的口述史料。

其中，东北抗日义勇军及抗联战士的口述档案尤为珍贵。这批档案总计122件541页，收录了200余位亲历者的讲述，其中重要人物超过百位，现已结集出版为《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——东北抗日义勇军、抗日联军亲历者口述档案汇编》。翻开这本厚重的汇编，记者发现，档案内容广泛记录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抗战图景：既有“流亡学生”投笔从戎，以青春热血书写报国壮志；也有土绅变卖全部家产，全力支持抗战；还有工农群众携手并肩、东北军旧部奋起抵抗、绿林武装投身抗日洪流。这些鲜活片段，从多维度勾勒出黑土地上不屈的民族精神。纸页间，这些名字，应当铭记——工人群体：兵工厂的工人李春元、吴三铁匠、窑厂的马庆福等；土绅代表：白云普、林子升、张景恒等；爱国学生：宋聚、金硬、江东之、纪亭榭等；绿林武装：老北风、项青山、高老梯、

赵亚洲等；……口述中，这些话，令人震撼——“参加义勇军的官兵，均不发饷，都自带干粮，所以武装不齐，没有武器的占十分之一”；“我大哥将自己的主要家产变卖，买了枪支弹药”；“当时的口号是：不伤人、不骂人、不抢老百姓的东西，就是打日本帝国主义，收复东北，不当亡国奴”；“国家都没有了还要家干啥？我们必须抗日才行”；……“作为档案工作者，我们责无旁贷。”王梓熠表示，沈阳市档案馆将持续做好抗战专题档案的保护与利用工作，“每一份档案的留存，每一行文字的识别，每一个名字的重现，都是对历史负责，我们要让这些珍贵档案永久发挥作用”，让“未完的讲述”永远继续下去，让后代都能听到先辈们的故事。



王梓熠与同事一起深入挖掘、系统梳理馆藏抗战专题档案。



扫码观看视频
《讲述》未完……》



沈阳市档案馆珍藏着一批特殊的口述档案。